

财经易文

一部关于经济、政治、军事和制度发展史的力作。

——约翰·伯格 (John C. Bogle), Vanguard集团创始人、前CEO

财富|的|诞生

现代世界繁荣的起源

The Birth of Plenty



【美】威廉·伯恩斯坦 (William J. Bernstein) 著

易 晖 欧阳珊 姜汉忠 译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财富的诞生

[美] 威廉·伯恩斯坦 (William J. Bernstein) 著

易 晖 欧阳珊 姜汉忠 译

The Birth of Plenty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财富的诞生/(美)伯恩斯坦著;易晖等译.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7

书名原文:The Birth of Plenty

ISBN 978 - 7 - 5005 - 9755 - 1

I. 财… II. ①伯… ②易… III. 经济增长—研究

IV. F06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0579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 - 2004 - 4303 号

William Bernstein

The Birth of Plenty

ISBN 0 - 07 - 142192 - 0

Copyright © 2004 b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language published by McGraw-Hill, a division of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published and distributed exclusively by China Financial &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under the authorization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 Co.,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SAR and Taiwan. Unauthorized export of this edi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Violation of this Law is subject to Civil and Criminal Penalties.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美国麦格劳-希尔教育出版(亚洲)公司授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独家出版发行。未经许可之出口,视为违反著作权法,将受法律之制裁。

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封面贴有 McGraw-Hill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webmaster@ewinbook.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100036

发行电话:010 - 88191017

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16 开 23.5 印张 310 千字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49.80 元

ISBN 978 - 7 - 5005 - 9755 - 1 / F · 8473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当代世界的繁荣从何而来*

在《美国的银行与政治》（*Banks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Civil War*）一书的序言中，布雷·哈蒙德（Bray Hammond）写道：“这是一本关于政治、银行和历史的书。但读这本书的政治家会认为作者不是一位政治家，读这本书的银行家会认为作者不是一位银行家，历史学家认为作者不是历史学家，经济学家认为作者不是搞经济的，而律师也会认为作者不是搞法律的。如果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事实，那么很可能就没有写这本书的必要，而按更加爱挑剔的读者的说法，世界也不会变得更糟糕。”威廉·伯恩斯坦是一位神经病学家，但这本《财富的诞生》并不是关于神经系统紊乱的著作。

最初，经济学只是伯恩斯坦的一个业余爱好。他的兴趣在储蓄、投资和资源配置的整个过程方面，也许他的最终目标是把他挣的钱投入到医学研究中。他决定与人们分享他学到的知识，因此，他建立了 efficientfrontier.com 这个网站，而这一网站如今已经成为深受独立投资者喜爱的论坛。他还写过两本关于投资的著作：《投资的四大支柱》（*The Four Pillars of Investing*）和《聪明地配置资产》（*The Intelligent Asset Allocator*），这两本书的内容经常被《华尔街日报》引用。

在开始写作《财富的诞生》一书的前几年，伯恩斯坦碰巧看到了由“晦涩的苏格兰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汇编的从公元元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增长数据库。从这些数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1820 年以前实际上没有什么增长（按人均 GDP 衡量），而此后的增长显得强劲且稳定。这一问题令他难以理解：为什么？为什么在技术进步的支持下，经济增长能够突然爆发？为什么佛罗伦萨人没有能够发明达芬奇描绘出的蒸汽机？为什么罗马人没能发明电报？伯恩斯坦决定

“揭示出在 19 世纪初汇聚在一起并激发了现代世界伟大的经济腾飞的文化和历史因素”。他还希望为读者提供一个能够解释所有国家贫富的原因，以及它们的居民是否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

伯恩斯坦的主要假设是：制度——人们在其中进行思考、互动和从事商业的框架——是国家经济表现的基础。更明确地说就是，四种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

- 可靠的财产权，不仅是针对实物资产的权利，还包括知识产权和公民自由。
- 科学理性主义或科学方法，即分析和解释世界的系统方法。
- 现代资本市场，它可以为新发明的开发与生产提供融资。
- 交通与通信技术，这些技术可以传递重要信息，能够将人员和商品运输到世界各地。

只有当这四个要素全部具备后，一个国家才能繁荣起来，因为这些因素降低了对人的创造性的限制，使得发明的数量大增。

对于那些有机会学习经济史的人来说，伯恩斯坦的这些假设并不是非常新颖的。的确，其他人早就谈到过这些问题，但使得《财富的诞生》这本书吸引人的地方是作者将前人的研究成果以一种符合逻辑的方式综合在一起，并以朴素、轻松、睿智的方式写出来，很少有经济史学方面的著作能够像这本书一样使读者一口气读下去。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增长的来源、国家和结果。在第一部分中，作者分章节描述了四大要素。在描述的过程中，作者尽可能地进行回溯，以追踪这些要素的变化轨迹。第二部分的目的是考察各个国家间不断扩大的差距的起因。作者试图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最早富裕起来，一些国家紧随其后，而其他国家则至今还非常贫穷。在最先富裕起来的国家中，作者重点讲述了英国和荷兰；在紧随其后的国家中，作者分析了法国、西班牙和日本逐渐发展起来的原因；对于现在处于落后地位的国家，作者分析了土耳其帝国和现代阿拉伯世界在曾经的辉煌后逐渐衰退的原因。本书第三部分讲述了宗教、财富、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分析了经济增长与幸福之间的关系，以及财富分配不均的影响，并论述了财

富和国家力量的关系。

由于本书引用的资料极其丰富，在此我们不可能更详细地描述本书的内容。这本书给人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是作者围绕哥白尼、培根、布拉赫、开普勒、伽利略、牛顿和哈雷的贡献而展开的对科学理性发展历史的描述，同样引人入胜的是英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立的故事。在本书中，读者还可以找到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发现爱迪生如何为其发明（电灯泡）进行融资，以及在工业革命时期人们悲惨的生活状况。

除了讲述本书的主要假设外，作者还试图说明其他一些问题。例如，他认为拉丁美洲当今的经济状况主要是由过去的殖民者为这里留下的“制度遗产”造成的。他还指出，帝国主义和自然资源不是决定一国经济表现的关键因素，而一国的制度才是最重要的。作者区分了各个国家常常提出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们做错了什么？”第二个问题是：“是谁让我们惨遭失败的？”如果国家把重点放在第二个问题上，事情就严重了。

伯恩斯坦还试图证明富裕和贫穷与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关系更大，与宗教的关系则小一些。作者详细说明了是传统文化对变革的抗拒而不是宗教使得人们不愿意把他们心爱的理论拿出来接受实践的检验。

此外，作者认为，是财富导致了民主的产生，而不是相反，在经济增长出现几十年后，一国的民主才能发展起来。如果一国的国民奴性十足，那么民主制度是不可引进这个国家的。随着国家越来越富裕，人民表达自己意见的愿望会不断提高。

作者在本书中多次讲述了政府的作用，但通常都是负面的。作者强调了政府官员的寻租与腐败行为，尤其是在那些统治者不完全受制度约束的国家这一现象更加明显。伯恩斯坦认为，将富裕与贫穷区分开来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法治，而这一问题引起人们大量关注的原因是：它是唯一一个不能轻松获得的因素（不包括在四个要素之中）。政府要为其效率负责，因此我们陷入了政府与法治的恶性循环中。

经济史学家要想写出一本类似于《财富的诞生》的书并不是不可能的，但伯恩斯坦某种程度上的“旁观者”身份使他能够在300多页的篇幅里用既轻松又严肃的方式完成描述现代世界财富诞生这一难以完成

的任务。本书适合于所有对经济史和制度经济学感兴趣的人士参考借鉴，尤其是学习经济学的学生，因为在宏观经济学和经济发展之类的课程中没有详细描述各国经济表现的差别。也许没有这本书世界也不会变得更糟糕，但我们还是应该期待伯恩斯坦写出更多通俗易懂的作品。

Marijana Baodun

* 本文译自 Finan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30 (3), 307-309 (2006)，标题是编者加的。由于无法与作者取得联系，请作者看来本书后与我们联系。

前言

Preface

几年前，我妻子从图书馆带回家一本书，奥鲁尔克（P. J. O'Rourke）的《吃掉有钱人》（*Eat the Rich*），那时候我并没意识到自己正处在洞察历史的路途上。奥鲁尔克的书写得轻松幽默，他解剖世界经济奇迹，讲述那些不无悲惨的故事，读来却颇让人解颐，而他对信贷危机的揭露，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个时代，人们往往把垃圾债券直接卖给自己小兄弟，而优质债券却要通过金融大鳄来倒手卖给自己的兄弟。

奥鲁尔克轻松幽默的笔调中充满了大量不辞辛苦弄来的材料。表面的讽刺之下，是一些学术性很强的段落。书中还征引了一位苏格兰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收集的晦涩的经济数据。麦迪逊通过研究 1820 年前后世界经济的增长状况，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异的断裂点：在那之前，世界经济毫无增长可言，此后则是持续的增长与繁荣。

后来，我找到了麦迪逊的那本著作：《追踪世界经济：1820 ~ 1992》（*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1820-1992*）。这本书像大部头的法律文集般枯燥乏味，让人不堪卒读，但那些干巴巴的数据背后讲述着一个伟大的故事：现代世界的经济诞生。该书还富有说服力地纠正了人们对日本经济的错误印象：许多人认为日本的繁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其实在明治维新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短短 40 年里，日本经济扣除通货膨胀后的年均 GDP 增长达 6%，人均寿命翻了一番，国民受教育率是此前的 4 倍，文盲迅速消失。

从那以后，我开始对西方世界财富的迅速增长感到着迷。麦迪逊本人作了一些简单的、语焉不详的解释。他简要地提到科技发展、贸易增长、金融和人力资本、自然资源的开发，还有一些含混不清的经济概念，比如“增长核算”，这些都难以让我满意。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是老生常谈。准确地说，经济增长本来就是技术创新的产物，当今世界，如果电子、交通技术乃至科学发展停滞下来，那么经济增长也将随之止步。

但这样一个问题始终纠缠着我：为什么世界经济在那样一个时代获得了爆发性的增长，而且科技发展开始为它提供动力？为什么佛罗伦萨人不能发明蒸汽机和达·芬奇早已勾画出来的飞行器？为什么有着丰富冶金技术的罗马人不能发明电和电报？为什么精通数学的古希腊人不能描述出概率论——如果没有它，现代资本市场就不起作用？进而言之，为什么雅典人在亚历山大大帝的领导下打败了波斯人，却在两个世纪里依然过着令人同情的穷日子——他们本来有着人所公认的发展经济的条件——民主制度、私有产权、自由市场以及一个自由的“中产阶级”？而最为重要的是，为什么直到19世纪，霍布斯描述的“孤独、贫穷、肮脏、粗野和短缺”的西欧，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就消失了？

对于上述问题，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在《现代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Modern*）作出了迄今为止最准确的回答。他对19世纪初期科技、政治、文学以及艺术革命的描述堪称无与伦比。相比麦迪逊的著作，他的《诗人的早期现代发展史》（*Early Modern Developmental History for Poets*）就像一本优美的散文。但为什么这些变化对那段时期的历史性转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这样一个终极问题，约翰逊仍然无法解答。顺着另一条路线，贾里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著作《枪炮、宝石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则试图解答“Yali的问题”——为什么白人能够摆弄出那些先进的“玩意儿”？（Yali是非洲几内亚部落的一名男子，他说的“玩意儿”是对西方先进发明的概称——比如钢斧、软饮料、雨伞等。）虽然戴蒙德的著作从生物学与地理学的角度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行了令人惊叹的分析，但他对那名部落男子令人悲伤的质疑依然是沉默不语。

因此，在本书中，笔者试图揭开发生在19世纪早期，进而引发现

代世界经济起飞的文化与历史要素。笔者认为，采取非虚构的材料挖掘与陈述要强过某种单线条的历史叙述，并且帮助读者理解现代世界，不管那些历史叙述如何能够自圆其说。在我看来，要想揭示出世界繁荣之起源，会遇到两个挑战。首先，每一位作者都想讲清楚一个“故事”——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而如果作者讲的这个“故事”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那只能是作者的失职。第二个挑战是必须提供给读者一种结构式的理解方法，这一结构方法能够回答世界上的国家——不光是本书所涉及的那几个——何以富裕或贫穷，民主或专制，弱小或强大，甚至能够回答每个国家的国民是否对他们的生活状态感到满意。做到这一点，将有助于读者把握我们这个星球和她的人民的未来命运。

因此，本书很自然地分为三部分：世界为什么会这样，如何变成这样，以及我们将走向何方。首先，本书将努力揭示经济增长的各种源动力；其次，本书要描述这些动力在不同国家扮演的角色；最后，本书将集中讨论引发现代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的社会、政治和军事原因。通过这些讨论，我们还能发现，对经济增长动力的理解，将有助于我们观察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 总体而言，我们这个世界不光是越来越富裕，同时也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变化迅捷，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对地球上的芸芸众生而言，未来会让我们幸福和满意吗？
- 发达与民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经济发展以及由此造成的国家之间的贫富分化，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全球政治局势？一些专制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的前景如何？
- 现代世界的繁荣如何影响世界力量的均衡？美国军事力量的优势作为一个历史事件，能够持续下去吗？一些非西方国家，尤其是穆斯林国家，会如何有效发挥其政治与军事力量？



没有人敢声称自己精通世界经济增长问题所涵盖的一切领域——法律、历史、哲学、天文学、神学、公共政策、社会学，当然还有经济

学。笔者同样不敢。因此，我十分感谢那些帮助我写作本书的人，他们曾为我指明正确的方向，给予我正确的方法，为我编辑书稿，在长时间的写作中给我莫大的鼓励。

埃德·道尔从一开始便成为我写作道路的伙伴，他教会我复杂的贸易理论，从他做本科生、研究生到成为这门高深莫测而又枯燥乏味的学科的专家，几十年来他一直以相关知识来哺育我。三年前，埃德就建议我写一本有关经济史的书——他并不知道我在那之前的几个月已经暗中开始了——并给予我从事这种写作的精神养料。罗伯特·埃里克松提供给我关于古巴比伦“新月沃地”财产权的未发表的文稿；马克·罗伊也给过我有关财产权的执行成本的未发表文稿；维克多·汉森帮我找出古希腊人在财产法律方面的材料；理查德·伊斯特林引导我思考金钱与幸福的关系；斯蒂芬·丹帮助我提高了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历史作用的理解；阿历克斯·约翰逊不辞辛劳地指导我钻研知识产权的历史——没有他的帮助，我对这一领域永远不会懂得那么多；罗伯特·阿诺特教我深入领会即将到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卡尔·阿朋纠正了我对中世纪继承权的错误理解；罗伯特·巴诺给过我很多有关增长的相互关系的数据和图表；格里高利·克拉克给了我几个世纪以来英国的经济发展变化图；伊曼纽尔·萨伊兹给了我收入分配方面的数据；吉姆·平林给了我美国专利局的活动数据；在本书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历史问题上，沃尔多·托布勒、杰克·格尔斯顿、杰·帕萨乔夫、罗伯特·尤弗斯、奈尔·弗格森、保罗·肯尼迪、唐纳德·莫格里奇、罗伯特·斯奇德尔斯基、拉里·尼尔、简·阿尔伯特，以及理查德·希拉都曾慷慨相助。我还要特别感谢朗·英格哈特，他曾引导我走出经济与文化、宗教复杂关系的“沼泽地”，并给予我大量的说明材料。

我也曾得到一些金融和经济刊物的编辑们的帮助。威廉·斯库塞斯给过我许多批评性建议；依阿华（Iowa）公共电台的伯纳德·谢尔曼自始至终参与了文稿的编辑工作，尤其在公共政策领域，多次帮我解决难题；《华尔街日报》的乔纳森·克莱门斯在许多问题上慷慨帮助过我，从行文风格、结构安排到探讨英国知识分子历史，书中许多章节里都留有他的印迹；《金钱》（*Money*）杂志的贾森·茨威格以他极具特色的专业技能、火眼金睛般的识别力、令人叫绝的幽默感，以及百科全书般的

知识结构来帮助我；约翰·丹托尼奥则帮助我掌握初稿的写作过程，他像个严格的工头，又是位才华出众的编辑家。

在写作后期，朱迪·布朗贡献了她的专业技能和文学才能；唐·戈耶蒂也为我做了许多编辑工作，尤其是大部分图表的编辑工作；凯瑟琳·达索伯罗斯既运用她本人的才能，又通过麦格劳—希尔出版集团的资源来帮我完善对现代世界经济的描述。

我的朋友与家人对本书的写作也是不可或缺的。查尔斯·豪罗威博士在古欧洲、古希腊以及语法知识方面给了我很大便利；我女儿凯瑟琳·齐格勒给了我许多社会学知识方面的帮助；凯茜·格罗斯曼和里克·格罗斯曼帮我校对了最终稿。此外，如果不是我的妻子简·齐格勒，我根本写不出这本书，她把我写出来的乱糟糟的材料编辑成章，把那些行话和速记符号变成流畅可读的文字，不厌其烦地修改那些缺乏头绪的内容，以她令人惊异的忍耐和巨大的努力来帮助我。

导 言

Introduction

百夫长号（HMS Centurion）的船长有充分的理由感谢钟表匠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1737 年春末，他带着 H-1 型航海天文钟（marine chronometer）——一种计算经度的庞大却相当精确的仪器——进行了第一次海上试验。当英国海岸模模糊糊地出现在地平线上时，“百夫长”的导航员用传统的航位推算法（dead reckoning）计算出他们正在达特茅斯南部安全水域航行。哈里森却不这样认为，他的仪器计算出他们离达特茅斯尚有 80 英里，处在一片危险水域之中，离位于英格兰西北角的利泽德（Lizard）半岛已经不远了。舰艇指挥官普罗克特（Proctor）船长毫不犹豫地指挥船向东行驶，几个小时后人们发现，哈里森的计算完全正确。

普罗克特的谨慎对于当时的航海者来说很容易理解。此前 30 年，也就是 1700 年左右，海军上将克洛迪斯利·夏威尔爵士（Admiral Sir Cloudisley Shovell）带领他的舰队驶进了锡利群岛（Scilly Isles），2000 名官兵溺水而亡。这一重大灾难使得英国公众开始关注导航技术的进步。7 年后，即 1714 年，议会通过了《经度法案》（*Longitude Act*），成立了经度委员会（board of longitude），并悬赏 2 万英镑（大致相当于今天的 100 万美元）奖励任何找到能够确定物体位置、精度误差在半度（约 30 英里）以内的方法的人。

除了要感谢哈里森的救命之恩外，普罗克特还在不知不觉中亲眼目睹了历史上最伟大的转折点之一，这一转折几乎可以与蒸汽机的发明、代议民主制（representative democracy）的进步或滑铁卢战争相媲美。能

对航行提供可靠保障的航海天文钟的诞生，使得曾经充满各种不可预测的危险甚至是死亡之旅的海上贸易成为了制造财富的机器。

250 多年后，哈里森航海钟作为航海史上的一个奇迹，被陈列在格林威治国家航海博物馆中，直到今天，它每天的运行误差仍然不超过几分之一秒。然而，在 1730 ~ 1850 年那个技术大飞跃时代，它根本毫不起眼——很少有人见过航海天文钟，而那个时代其他的伟大进步，如现代运河系统、蒸汽机和电报，每个人都见识过。

现代的曙光出现以来，人们就自信地认为，自己所处时代的技术进步是独一无二的、革命性的——当然，我们也不例外。然而，这只是一种幻觉。为了理解科技进步对人类社会完整的影响，我们需要研究在那 120 年里发生过的技术大爆炸以及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生活因此而发生的改变。交通速度一口气提高了 10 倍，通信几乎可以在瞬间完成。就在 19 世纪初，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美国政治家，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起草人——译者注）从蒙蒂塞洛（Monticello）到费城（Philadelphia）需要 10 天的时间，还需要准备一大笔交通费用、经受肉体的劳累以及各种危险。等到 1850 年，蒸汽机车的出现使得这一旅程在 1 天内就可以完成，所需费用、经受的劳累以及危险却只是原来的零头。斯蒂芬·安布罗斯 [Stephen Ambrose，美国通俗历史学家，著有数十本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品，《拯救大兵瑞恩》（*Saving Private Ryan*）和《兄弟连》（*Band of Brothers*）等影视作品均改编自其著作——译者注] 在《英勇无畏》（*Undaunted Courage*）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在 1801 年，一个重要的现实是，任何物体的移动速度都不会超过马的速度。人类、生产的产品、信件、信息、想法、命令或指示都不可能比这移动得更快。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以更快的速度移动，而且对杰斐逊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以后也不会有。

随着 1837 年威廉·福瑟吉尔·库克（William Fothergill Cooke）和查尔斯·惠斯通（Charles Wheatstone）在英格兰发明了电报技术，即时通信迅速地改变了经济、军事和政治事件的面貌，使得那个世纪由于飞机和计算机的发明所产生的影响相形见绌。在电报出现以前，原始的通信方式常常会带来大大小小的悲剧。例如，1851 年，安德鲁·杰克逊

(Andrew Jackson, 美国第七任总统——译者注) 在新奥尔良击败英国人时, 双方已经于两周前在甘特 (Ghent) 签署了和平协议。

进入 1850 年以后, 技术进步的步伐没有加快, 反而慢了下来。生活在 1950 年的西方普通人可以轻松地掌握 2000 年的技术, 但生活在 1800 年的人会被 50 年后的日常生活搞得晕头转向。

对历史和文化的定量分析只能告诉我们这么多东西。对进步的基本度量来自数量统计: 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人的寿命和财富产生了哪些可衡量的提高? 当我们面对这些数字时, 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 在 19 世纪早期的某一时点确实发生了一些事。在此之前, 人类的进步速度缓慢且时断时续, 而自那时起, 则是既显著又稳定。

这并没有贬低文艺复兴后的三个世纪以来文化与科学进步的价值。但显而易见, 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 我们可以知道文艺复兴和早期的启蒙运动只是最低限度地提升了普通民众的素养。衡量文化与科学进步的最佳途径是从其最基本的层面上进行分析。意大利、法国、荷兰和英国的人均经济产出在几个世纪中如何增长? 预期寿命发生了什么变化? 教育水平有了怎样的提高?

由于经济史学家在过去几十年中的努力, 人类进步的定量图景逐渐清晰起来, 数字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直到 1820 年左右, 人均世界经济增长 (per capita world economic growth) ——描述人类物质进步的最好的指标——接近 0。在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几个世纪, 欧洲的财富实际上在减少, 许多重要的技术也失传了, 其中最重要的水泥生产技术是在 13 个世纪以后人们才重新掌握。

前现代时期最大的悲剧是在 1000 多年中庞大的知识体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古腾堡 (Gutenberg, 德国活版印刷发明人——译者注) 和培根 (Bacon) 之前, 发明家缺乏我们今天认为他们应该具备的两项优势: 扎实的信息储备和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缺乏科学的研究方法意味着技术进步只能依靠反复试验, 因此发展非常缓慢。另外, 就算发明者和生产者能够记录下他们的试验结果, 也很难被继承下来。结果, 发明常常“失踪”, 古代技术与经济状况常常是有了一点儿进步后就被随后的倒退所抵消。

的确, 从大约公元 1000 年开始, 人类生活的福利水平有所提高,

但提高得太慢了，而且并不可靠，在人们平均 25 岁的生命中几乎觉察不到。接着，在 1820 年后不久，繁荣以不可阻挡之势涌现，对后来的每一代人来说，下一代人总会比他们的父辈生活得更舒适、更见多识广、更具预见性。

本书即将探讨这种变化的本质、原因和结果。在第一部分中，我将利用新的数据讲述令人信服的故事。我将确定经济增长在沉睡了 1000 多年后重新迸发出活力的时间与地点。我还会讲述并考察四大要素——财产权（property rights）、科学理性（scientific rationalism）、资本市场（capital markets）和交通与通信技术的进步——的历史，这四大要素是激发并维持经济增长和人类进步的根本因素。

第二部分将讲述这些因素何时以及如何发挥作用：首先在荷兰，然后是英格兰及其文化继承者，并被欧洲其他地方和日本接受，最后是东亚及其他地区。对于每一种情况，我都将仔细分析其增长的起因，并得出结论：直到上述各因素皆准备就绪后，一个国家才能繁荣起来。

尽管我在本书中尽量保持国际视角，但很多读者会发现，本书的叙述还是过多地以欧洲为中心。中国——发明造纸术、活字印刷术、火药（还应包括指南针——译者注）的国度——难道不是前现代时期世界上伟大的创新发动机吗？当欧洲还处在黑暗时代（Dark Ages）时，早期的阿拉伯难道不是知识和文化的绿洲吗？印度的数学家不是创造出包含 0 这一概念的数字体系而远远领先于以字母为基础的古希腊罗马（Greco-Roman）体系吗？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但这些国家都没能像现代西方一样持续、永久地提高其国民生活水平。另外，造就现代财富的四大要素中，财产权产生于普通法（common law），科学理性、先进的资本市场以及交通和通信技术的飞跃主要起源于欧洲。尽管繁荣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现代财富的温床是格拉斯哥（Glasgow，苏格兰西南部克莱德河上的一座城市，建于 6 世纪晚期——译者注）至热那亚（Genoa，意大利西北部的港口城市——译者注）之间的地区。

最后，本书的第三部分将探讨在经济繁荣的社会诞生过程中导致的个人同国家财富在社会学、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结果上存在的巨大差异，以及这种矛盾对未来的影响。

现代社会科学的进步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关于社会价值、财富和政治问题复杂互动的窗口。坏消息是：在一个日益繁荣的世界，人们不一定越来越幸福，西方世界尤为如此；但好消息是，发展中国家的个人福利正在取得实质性的提高。随着国家从第三世界发展到第一世界，其国民确实感到更加满意。我们还会发现，是经济发展而不是其他途径带来了民主政治——“过度”民主实际上不利于经济增长。法治（rule of law）是一个健全的财产权体系的必要保障，而财产权是经济繁荣的基础。反过来，经济繁荣又是使民主政治繁盛的肥沃土壤。因此，在一个传统文化与法治背道而驰的国家，对民主发展充满乐观的思想往往代价高昂而且十分危险。

我还会证明，国家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经济活力决定的，而不是由反复无常的战争、文化和政治决定的。美国凭借其军事实力持有世界霸权不是偶然。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世界强权的命运都是衰退和毁灭，只有当其他国家在经济生产率上超过美国，并且对展示权力有兴趣时，美国才会衰落——但近期似乎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通过考察我们的世界在当时当地是如何繁荣起来的，我们或许能够预言我们将去向何方。



关于货币的一点说明

像任何一本金融史书一样，本书也会涉及当时的货币——如英镑、西班牙比索、威尼斯达克特（ducat）、佛罗伦萨佛罗林（florin）、法国里弗尔（livre）等。我没有把这些数据换算成以当前货币表示的数据，因为这种换算会产生误差。

对于希望了解这方面信息的读者，下面这些近似值会有所帮助。纵观欧洲历史，大多数国家货币的标准单位都是一枚小金币，如几尼（guinea，比1英镑的币值略高一点）、里弗尔、佛罗林或达克特，它们的重量约为1/8 盎司，现在大约值40美元。1500~1800年间，一位英国